

涼茶舖裏的灣區故事：從香港銅葫蘆到澳門「廿四味」

梅毅

在香港中環的街角，有一座掛着銅葫蘆招牌的老字號涼茶舖。走到近前，氳氳的藥草香裹挾着市井煙火氣撲面而來。這座百年老店，不僅是嶺南人對抗濕熱氣候的智慧見證，更承載着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都會的歷史變遷。從葛洪採藥到王老吉開舖，從勞工解暑到都市養生，涼茶文化的每一次轉身，都映照着灣區社會的深層脈動。

涼茶的誕生，源於嶺南人與自然的博弈。嶺南地區自古多濕熱瘴氣，東晉道家醫藥家葛洪南下嶺南時，見此地「瘴癘流行、溫病橫行」，遂以《肘後備急方》為基礎，採集夏枯草、金銀花等草藥配伍成方，用於防治疾病。這種就地取材、以中草藥煎煮成的湯劑，奠定了涼茶的雛形；而這種「藥食同源」的智慧，也逐漸演變為嶺南地區的日常生活。至清代，廣州十三行誕生了第一家涼茶舖「王老吉」，標誌着涼茶從家庭配藥走向商業化。港澳地區因地理環境與嶺南一脈相承，涼茶文化在此扎根尤深。清代的苦力、漁民將涼茶配方帶入香港、澳門等地，銅葫蘆、竹蔗茅根水等基礎款涼茶開始在碼頭流傳。

從前的香港，涼茶更顯社會分層。一八六四年前港英政府禁止華人看西醫，基層勞工患病時，只能依賴涼茶緩解頭痛發熱。銅鑼灣的碼頭工人常聚在涼茶舖，一碗苦茶即是藥方，因而老輩人常說「飲一杯涼茶，不用找醫家」。一九一六年在香港開業的「春回堂」，既賣涼茶又設中醫問診，形成「前舖後醫」的特色模式。銅葫蘆裏的藥汁既是飲品，也是基層老百姓的治病良方。

五六十年代的香港，涼茶舖迎來空前繁

榮。當冰室下午茶要價三角時，涼茶舖以「一毫子一碗」的平民價格，成為普羅大眾的避暑聖地，也是勞工階層消遣的重要場所。碼頭工人結束勞作後，喝一碗廿四味，頭頂吊扇輕搖，收音機裏播放着「麗的呼聲」電台的粵曲，點唱機投幣聲與談笑聲此起彼伏。涼茶舖天花板旋轉的吊扇、牆壁張貼的泛黃海報，苦中有甜的美妙味覺，構成了老港人的集體記憶坐標。當然，涼茶配方也隨需求演變。廿四味、五花茶、竹蔗茅根等經典配方應運而生，針對着不同症狀提供「定製」調理。銅鑼灣「恭和堂」更將龜苓膏與涼茶搭配，開創「苦盡甘來」的味覺哲學。

澳門的涼茶史同樣厚重。一九五八年《澳門年鑒》記載，僅十五萬人口的澳門已有二十八家涼茶舖、逾百家涼茶檔。老字號「顯記涼茶」以「送口涼果」配飲，並設報刊、收音機招攬顧客，將實用性與市井趣味融為一體。而「大聲公涼茶」更延續二百年手工傳統，店主親自採藥、熬製，一直以無糖菊花茶、羅漢果茶等經典維繫街坊情誼。澳門的「廿四味」配方尤具特色。雖名為「廿四」，實則根據季節與體質動態調整藥材組合，少則八味、多則十餘味，既有祛濕的雞骨草，也包含潤肺的羅漢果。這種靈活配伍，體現了中醫「因人制宜」的精髓，也讓澳門涼茶在商業化浪潮中保留了一絲古早匠心。

七十年代西醫普及化浪潮中，香港涼茶業經歷生死考驗。老式涼茶舖從一九七三年的一千二百家，銳減至千禧年的不足三百家。危機者，機會並存也，這種危機也催生了產業革新。鴻福堂首創瓶裝涼茶，讓藥飲走出舖頭、



▲香港歷史博物館「香港故事」展覽，曾重現數十年前的涼茶舖場景。圖片來源：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

走進雜貨店；海天堂開發龜苓膏軟糖、雪梨海底椰等衍生品，迎合年輕人口味。這種「傳統內核+現代包裝」的模式，將「清熱解毒」的功能訴求轉化為「養生美學」的生活方式，也使涼茶從治病湯藥轉型為都市養生飲品。這種轉型背後，蘊含着文化價值的重構。二〇〇六年，粵港澳三地聯合將涼茶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標誌着這一文化符號從市井走向文化殿堂。二〇一四年香港將涼茶定義為「以人為核心的傳統實踐」，列入非遺清單。澳門方面，借助涼茶的「非遺」身份拓展國際影響力，部分老舖引入生產線，以環保包裝將涼茶銷往東南亞乃至歐美。

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成為涼茶回歸療癒本質的契機。香港多家涼茶舖發起「愛心贈飲」，將裝有金銀花、板藍根的涼茶包送至隔離中心，不斷上演「涼茶送溫情」的場景。同樣的場景也在澳門延續：氹仔老字號「李康

記」每天熬製廿四味免費派發，苦味藥湯裏熬煮着灣區同舟共濟的精神。這種「推己及人」的濟世精神，與百年前春回堂向碼頭贈送涼茶的場景遙相呼應，印證了涼茶不僅是飲品，更是百姓面對困境時的精神慰藉。恰如深水埗百年老舖門聯所書：「但求世上人無病，何愁架上藥生塵」。

如今，香港中環的銅葫蘆老舖與澳門賣草地街的涼茶車，仍在訴說着灣區同源的水土記憶；而涼茶從「治病良方」到「養生潮流」的演變，更折射出傳統與現代在灣區社會的交融共生。涼茶舖的煙火氣裏，藏着灣區人務實、包容的生活哲學。無論是香港勞工在涼茶舖投幣點唱的一曲《獅子山下》，還是澳門老街坊端起涼茶碗時的一句「飲勝」，都讓這份苦盡甘來的滋味，成為粵港澳文化認同的鮮活註腳。這杯穿越千年的東方藥飲，每一碗都是歷史的回甘，每一間舖頭都是文化的驛站。它不只是大灣區百姓的舌尖記憶，更是一部用銅壺、瓷碗和草藥寫就的民間史詩——講述着普通人對抗時艱的智慧，記錄着城市變遷的年輪，更預示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浪潮中的新生可能。

作者簡介：梅毅，國家一級作家，中國金融作協副主席。長期擔任中央電視台《百家講壇》「梅毅話英雄」系列主講人。曾獲魯迅文學獎、華僑文學獎等榮譽。

七日談

（廣東篇）



玉淵櫻紅

北京玉淵潭公園內櫻花綻放，與中央電視塔「同框」。

市井萬象

中新社



英倫漫話

江恆

今年是英國作家石黑一雄以人工智能（AI）世界為背景的科幻小說《別讓我走》出版二十周年，對於當今AI的飛速發展，與二十年前相比，他的看法發生了哪些改變？

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石黑一雄，其所有作品都體現了對微小甚至平凡細節的關注。從《無可慰藉》到《長日將盡》，他在過去四十年來創作了許多最令人難忘的小說。但或許沒有一本書比他的第六部小說《別讓我走》更受人們的喜愛，該小說的銷量超過了他的所有其他小說，不僅被改編成一部主流電影，而且還被改編成舞台劇。

《別讓我走》講述了在AI世界人類培育克隆人的故事，幾位主人公在遠離塵囂的寄宿學校中長大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們意識到自己是刻意複製出來的克隆人，目的是最終用身體拯救他人的生命。這部小說圍繞着一個最基本、最不可避免的事實：我們都會死，但我們必須像沒有死一樣活着。用石黑一雄的話說，在某種程度上，我們人類無法完全接受自己的命運，因此我們渴望有特殊的安排，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們想要繼續活下去，更因為我們不想面對死亡帶來的痛苦、悲傷和孤獨。實際上，小說中的克隆人也有

作家眼中的AI世界

同樣的情感。石黑一雄在小說中開啟的一系列有關人類與AI世界的思路和主題探究，幫助塑造了他的後續科幻作品，包括《被埋葬的巨人》和《克拉拉與太陽》。總體而言，當時石黑一雄對於AI世界關注的重點，是希望、愛以及人類定位。其中《克拉拉與太陽》以具有思考能力的AI機器人克拉拉的視角，思索AI與人類的關係究竟能走多遠。當克拉拉負責照顧一名體弱多病的年輕人時，她在關心病人和了解這個家庭的同時，也開始思考自己的存在和生存意義，形成了自己的精神和對世界的熱愛。

由於《克拉拉與太陽》是在世界第一隻克隆哺乳動物多莉羊問世後創作的，引發了人們對富有的億萬富翁是否會克隆自己，進而造成人類社會不公的擔憂。實際上，石黑一雄對於AI領域正在發生的強大革命，一直在深入思考新技術將如何創造一個雙層社會：有些人從中受益並因此而得到提升，而另一些人則處於原有狀態，最終導致出現幾乎兩個不同的物種，即人類和超人類。顯而易見，他把這些對AI世界的擔憂寫入了早期的《別讓我走》以及後來的《克拉拉與太陽》之中。

如今距離《別讓我走》的發表已過去了二十年，石黑一雄對AI世界有了新看法，從當初關注AI可能造成的社會不平等，轉向了如何保護人類免遭AI控制的命運。他認

為，目前人類只是在考慮用AI來處理數據或做類似的事情，但很快AI就能弄清楚如何在人類身上創造某些情緒——憤怒、悲傷、笑聲。AI將非常擅長操縱情緒，而我們正處於這個邊緣。隨著AI技術的不斷增強，這種情況只會進一步加劇。

事實上，科幻小說提供了許多關於未來AI世界的設想，而作家往往比常人擁有更大的腦洞，很多人像石黑一雄一樣對機器人發出某種預警。比如上世紀六十年代，哈蘭·埃里森的《我沒有嘴，但我不得不尖叫》，被公認為是對AI主導的世界最殘酷的描繪之一：一個為發動核戰爭而製造的名為AM的機器人，殺死了大多數人類。阿西莫夫在《我，機器人》中，提出了人類今天仍在思考的有關機器人和AI的關鍵問題：我們什麼時候認定機器人具有感知能力？如果它們有了知覺，它們能感受到情緒嗎？那麼它們被我們奴役是可以被接受的嗎？威廉·吉布森在「曼廷」三部曲之一的《神經漫遊者》中，描繪了在不久的將來真正威脅人類的AI出現。而泰德·姜在《軟體物件的生命周期》中，探討了當代文化對新興AI的影響，並很快得出結論：我們可能發現自己周圍有數以百萬計的AI存在，我們需要像照顧孩子一樣照顧它們。因為它們像悶悶不樂的青少年一樣游手好閒，只會製造麻煩，而遠非一支順從的勞動力隊伍。我們人類需要擔心嗎？也許吧。

和而不同

對於藝術家而言，建立深厚恆久的友誼，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因他們太敏感，太推重個性和獨特，

故此在個人生活中，往往少了一些對於他人的共情與體諒。回望過去數百年藝術史，起初惺惺相惜、而後分道揚鑣甚至互相詆毀的例子屢見不鮮，而像雷諾阿（Pierre-Auguste Renoir，一八四一至一九一九）與塞尚（Paul Cézanne，一八三九至一九〇六）這般互相扶持且友誼恆久一生的藝術家好友，確屬少見。

正在香港藝術館展出的「塞尚和雷諾阿的世界——法國橘園美術館及奧賽博物館珍藏展」，透過五十多幅遠道歐洲而來的真跡名作，與我們分享藝術家之間的彼此體諒與珍惜，如何在各自的藝術創作中得以呈示。

塞尚和雷諾阿都是法國藝術家，且年齡相仿。二十多歲時，兩人在彼時的「藝術之都」巴黎相遇，年輕氣盛，一見如故。兩人的友誼迅速升溫，得益於他們對於繪畫發展的理念和預想不謀而合：兩人都極力反對傳統學院派的死板條框和局限，渴望在新的語境、新的理念中創新發揚。也正是在兩人友誼的肇端，日後在歐洲畫壇掀起巨浪的「印象主義」流派登場。一眾與塞尚和雷諾阿一樣勇敢且富有個性的年輕藝術家，冒着被沙龍畫展拒之門外、被資深畫評人嗤之以鼻的風險，轉身背對傳統，以色彩、光影，以此前從未被主流悅納的筆法和構圖，構建了一個迥然不同的藝術新世界。

儘管塞尚和雷諾阿性格不同（前者憂鬱、後者爽朗樂觀），儘管他們的創作最終導向了兩種並不相近的風格（前者關注構圖的秩序以及對於幾何元素的運用，後者偏愛以光影和動感描摹），但無礙兩人的友誼綿延一生。在相當程度上，這兩位印象派藝術家的創作彼此影響且互為啟發：在雷諾阿靜物畫《蘋果與梨》中，我們隱約見到塞尚靜物畫慣用的構圖；而在印象派畫家通常較少涉足的肖像畫領域，兩人則皆有不俗的建樹。

我因而想到《論語》中有一句「君子和而不同」。正因其不同，因其各具特色，才有繪畫世界之多元豐盈。

▲塞尚畫作《蘋果與餅》或影響了雷諾阿的靜物畫創作。圖片來源：橘園美術館



繽紛華夏

雲德

二十年前在報社辦副刊，正為一張呆板無趣的大樣發愁的時候，突然收到雲南記者站發來的標註為元陽梯田的彩照。照片上，與藍天白雲交相輝映的阡陌縱橫的梯田，以及豐收時節繽紛多姿的瑰麗景色，共同構成了一幅夢幻般的人間仙境，給人以強烈的視覺震撼，上版後瞬間令版面煥然一新。唯可惜當時沒彩版，黑白照片的效果比實景遜色了很多。但照片卻一直珍藏在我的電腦裏，它不但讓我印象深刻地記住了元陽，也埋下了定要一睹風采的決心。

未承想，這個美好心願期待了很久，一直沒機會得到滿足。直到去年春夏之交，有雲南朋友邀請去紅河參加一個民族題材的影視研討活動，我立馬爽快應約，心想，天賜的良機終於還是等到了。令人高興的是，主辦方亦善解人意，會議結束的當晚，採風活動就安排在元陽。為了能夠觀賞第二天的日出，我們每人拿着簡便的餐盒就急忙上路。汽車剛過個舊，天就黑了下來。好在大家一路說笑着，沒太在意車外的明暗。繼續行駛不一會，窗外隱約見

宛若夢幻的勝景(上)

到前方城市的燈光，與此同時，一股熱浪湧入車廂。司機忙提醒大家空調已開，趕快關窗。驚問其故，師傅則賣個關子，並不正面回答。只講旁邊就是元陽縣城，這裏是除版纳之外雲南平均氣溫最高的地方。而梯田的形成與維繫，直接得益於這裏的高溫，明天的現場自有答案。

第二天凌晨，按照入住前領隊的吩咐，大家穿上厚厚的外衣，集體驅車前往多依樹觀看日出。抵達時，儘管冷風襲人，觀景台上聚集的眾多遊客和攝影愛好者一點不為所動，爭相佔據有利位置，靜靜期待着第一縷陽光的降臨。然而，隨著時光一刻刻流逝，天空一直被潮濕且濃重的雲霧籠罩着，遠處的山巒在晨曦中若隱若現，像是被輕紗包裹的夢境。太陽和梯田彷彿都在灰蒙蒙的面紗下掩起了面容，羞於同大伙見面，再一次給期盼者留下了懸念。雖然情感上略有幾分失落，卻也絲毫沒影響到初來元陽的興奮，特別是霧中遊人、蒼山與大地渾然一體的朦朧景色，伴隨着清冷空氣中瀰漫的泥土芳香和耳邊輕輕迴盪着的鳥兒的歌聲，同樣給人留下別一番的韻味。

早餐過後，天公似乎也不情願大家難得的行程無端落空，陽光轉瞬普照大地，大伙

遊覽的興致立馬又高漲起來。

車子一到老虎嘴，元陽梯田的鬼斧神工般的壯麗景色迅即映入眼簾。這裏的梯田形狀各異，似龍脊、像鳳尾、如鏡片、若魚鱗，但卻上下一體、層次分明，約三千級的梯田如漩渦般依次向谷底盤旋，給人一種氣勢恢弘的壯闊感。陽光透過雲層灑在層層疊疊的梯田裏，從一畦畦宛如明鏡的水面上折射出耀眼的光芒，大小不一的泛着淺金、靛藍、玫瑰紫的光波連成一條條斑斕的緞帶，纏繞在山坡與稻田之間，形成了一道道光影交錯的奇幻景象。微風拂過，梯田裏的水波輕輕蕩漾，剛剛插過秧的綠色稻苗在水中搖曳，泛起層層漣漪，間或有鴨子流動的身影，彰顯着生命的靈動與活力。成片的雲朵不規則地掛在蔚藍的空中，薄如絲、厚若障，且不停地流動變幻着陣勢，起伏的山巒不時被白雲遮擋，碧綠的近山雖清晰可見，但墨綠的遠山卻時隱時現，它們與梯田的光波交互輝映，共同構成一幅氣勢磅礴、如夢似幻的水墨山水畫卷。在一個萬籟俱寂的廣闊空間，這近乎世外桃源般的神奇存在，不禁讓人驚嘆，也令人陶醉。甚至在為這人間仙境讚嘆與激動的某個瞬間，能夠清晰地體悟出一絲審美的窒息感。